
哈尼族聚居区的哈尼族 与汉族居民相互文化适应研究 ——基于云南省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调查

赵永乐, 何莹

(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蒙自661199)

【摘要】为了解云南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相互的文化适应情况,以哈尼族聚居区为目标,使用双维度文化适应问卷,对金平县马鞍底乡的511位哈尼族和汉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和访谈后发现,同化,分离和边缘化文化适应倾向得分都高于融合型,但不同民族间总体关系和谐。此外,哈尼族和汉族居民的文化适应倾向受到文化水平,定居时间,经济状况等社会因素影响,但具体表现有所区别。研究对可能影响文化适应状况的个人原因,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对如何促进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和谐进行了讨论;展望了在国内民族地区对双维度文化适应理论进行进一步检验和发展,并提升其应用价值的必要。

【关键词】哈尼族; 文化适应; 民族聚居区; 双维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6)05-0106-08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6.05.015

一、前言

【作者简介】赵永乐,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配置正义与关系正义双重视域中云南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XMZ066)阶段成果。

① Gibson MA. Immigrant adaptation and patterns of acculturation. Human Development. 2001, 44: 19-23.

② 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③ Cabassa L J. Measuring acculturation: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need to go.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2003, 25(2): 127-146.

④ 常永才:《人类学经典涵化概念的局限及其心理学视角的超越》,《世界民族》2009年第5期。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也被称为文化涵化, 可以泛指人与其他文化的人或社会信息接触时所产生的变化。^①文化适应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 特别在人口频繁发生跨文化流动的今天, 其重要性越发突出。文化适应的具体概念在不同时代有所差别, 但均涉及到人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迁移和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

传统文化适应的概念普遍认为, 不同相互接触的文化之间会相互接近并渐趋一致, 而且往往是“居于劣势的社会, 它的文化受到居于优势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急剧的变迁, 以求与居于优势的社会文化相一致”^②。这种阐释显然还未完全脱离“同化”(assimilation) 这一概念的影响, 也是历史上,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要求外来移民单方面适应本土文化, 采取“熔炉”政策的理论基础。

但这种观念无法解决二十世纪以来大规模跨文化移民带来的问题。尤其在美国, 受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 理论界也开始认可多元文化下稳定社会的可能性。反映在文化适应这一概念上, 文化适应的目标从单方变化变成了“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Herskovits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 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被带入另一种文化, 经调整使之适合该文化。^③ 根据这一逻辑, 文化适应可能是相互的, 这对单维度文化适应理论造成了冲击。

另一方面, 心理学在20 世纪得到迅速发展, 研究手段和理论都趋于成熟, 过去以田野研究为主的人类学者, 也逐渐接受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 催生了大量针对文化适应中心理现象的量化研究。^④这些心理研究将更加科学化的方法引入了传统人类学研究领域, 可以更准确的预测个体或者群体能否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以及社会发展前景, 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将这些量化研究手段与传统质性研究有机结合, 可以兼顾民族心理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 极大的推动了学科发展, 因而成为当代民族研究的一大趋势。^⑤

在此背景下, Berry 提出了基于个体心理变化的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他把文化适应界定为, 不同文化群体成员因接触而发生文化和心理的双重变化。该理论把文化适应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 即对新文化的接受程度, 和对原有文化的保留程度。基于这两个维度, Berry 又进一步把文化适应分为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 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四类, 并且强调个体的文化适应必然属于其某种情况, 因为所有个体都必然对环境的改变有所回应。^⑥ 在过去基于单维度理论的文化适应评价中, 是以对所谓“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度来评判个体适应水平的, 其中暗含了主流文化是更加正确选择的意思。而双维度模型在逻辑上将不同文化置于平等的地位, 而且不再简单的以适应或者不适应来说明文化适应

¹ ①植凤英, 张进辅: 《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整合》, 《民族研究》2007 年第6 期。

②D. J. Sam, J.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2006 年版, 第12 ~ 42 页。

③Alegria M, Shrout P E, Woo M, et al.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past year psychiatric disorders for Latinos living in the U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7, 65 (2) : 214 — 230。

④Ryder A G, Alden L E, Paulhus D L. Is Acculturation Unidimensional or Bidimensional? A Head — to — Head Comparison in the Prediction of Personality, Self — Identity, and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 (1) : 49 — 65。

⑤Cabassa L J. Measuring acculturation: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need to go [J].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2003, 25 (2) : 127 — 146。

⑥Schwartz S J, Unger J B, Zamboanga B L, et al.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accultu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0, 65 (4) : 237。

程度。这直接挑战传统理论中“主流同化少数”和“逐渐趋同”的基本假设，不仅符合人类学理论中，重视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平等的发展趋势，也得到更多心理学研究的数据支持，从而取代了过去的单维模型。

双维度模型还解释了一些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对“移民悖论”（immigrant paradox）的解读就是一例。移民悖论是指在移民文化适应调查中，经常发现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外来移民对当地文化适应得越好，其出现身体和精神方面健康问题的可能也越高。^⑤而多维度模型认为，这是单维度模型对适应类型划分过于简单导致，那些对当地主流文化接受程度较高的人，对原来的文化保持状况如何，是决定其适应水平的重要因素。能够对原有文化和新环境文化都适应的移民，其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放弃原有文化的人，因而健康问题也较少。鉴于多维模型对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具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也得到广泛的实证研究支持，当代文化适应研究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④⑤}

二、问题的提出

Berry 的文化适应理论进一步发展了Herskovits关于文化适应中相互对等的思路，认为文化适应在个体上是双向的，在群体上是相互的。主流群体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的到来，也可能在文化上发生一定的转变。传统意义上属于从属地位的所谓“涵化群体”，可能在适应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但不等于主流群体就不受影响。而且主流群体的变化，又会反过来通过群体间的互动影响到少数群体的适应过程。因此，要全面验证和完善多维度文化适应理论，还需要对所谓主流优势文化群体也进行研究。另外，Berry 的文化适应模型目前主要用于西方移民社会，在此范围以外，该理论能否普遍适用，仍受到一些质疑。因而理论界一直强调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进行实证研究。^⑥但当前的文化适应研究，多数依然是针对少数民族对优势文化的适应状况。这不仅是研究思维惯性问题，也有取样等方面的现实困难。

其中比较典型的障碍，是对主流群体的取样问题。看似占人口多数的主流群体，符合研究需要的被试却未必很多。例如，当涵化群体是人数较少，影响力较小的少数民族群体，此时多数主流文化成员其实很少有机会接触他们，更无需去适应，导致有丰富文化适应经验的主流文化成员不多。对此主流群体进行广泛采样，可能面临统计陷阱，即少数真正具有文化适应经验的主流群体人员，其数据特征被大量没有真实文化接触的成员平均化。最终测到的结果，可能仅仅是主流人群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这种刻板印象的虚构反馈。以往研究通常以选择特殊样本进行质性分析来避免这一问题，但在科学性与客观性方面存在局限。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寻找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相互密切接触的多民族群体。此外，过去很多调查研究为了方便取样，往往在大学生样本中做调查，事实上这是一个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经过了层层筛选的对象群体，用其检验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是不合适的。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民族聚居区进行实地入户调查，更符合此类研究的需要。

云南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自然人口分布，产生了一些处在绝对优势数量民族群体包围中的主流文化人群。特别是滇南地区，常住少数民族居民不仅种类和数量较多，而且经常世代杂居。其中，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当地特有少数民族居民，不仅保留了完整的聚居区，而且民族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价值观和教育观等均保存完整。同时，云南省历史上与中原地区交流频繁，而且自明朝起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使得很多民族聚居区内也散居着一些汉族居民，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文化接触。在民族聚居区内，区域内的优势少数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又被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包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的交流，使得这种局面更加普遍。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居民，都需要在文化上相互适应，以求在同一经济体内长期共存。他们之间的接触也更加全面，在各个年龄段和文化层次上都可能发生。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检验多维度文化适应理论的适用性，更能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提供建议。

三、方法

（一）目的

使用自编双维四类型文化适应问卷进行入户调查,结合实地访谈,对马鞍底乡的哈尼族和汉族居民相互的文化适应状况进行初步测量,以了解该地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现状,并尝试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同时检验Berry 双维四类型模型的普遍适用性。

(二) 对象

本文选取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哈尼族与汉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该地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97%以上,其中以哈尼族居多。该地的哈尼族民族文化传统保留较好,通过对林业资源常年的有序管理,^②当地自然生态保存相对完整,特别是保存了珍稀蝶类栖息地这一珍贵的自然旅游资源。该地因此近年来在国内具有了一定知名度,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活动增加,马鞍底乡与外界交流日益密切,外出务工和外来定居的人数都显著增加,使得该乡成为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包围的典型样本。本次研究以当地的哈尼族聚居区的哈尼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为具体对象,共计成功调查了511人,其中,男性254人,女性257人;哈尼族319人,汉族192人,该调查涵盖了当地绝大部分汉族居民。根据问卷对文化和文字理解力的要求,所有调查对象均年满18岁。平均年龄38岁,平均定居年限30.4年,文化层次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含在读大学生)这四类。

(三) 工具和程序

由研究人员实地入户发放问卷调查,辅以访谈。在查阅相关问卷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Barry于2001年发表的东亚文化适应量表(EAAM)为蓝本,该量表基于Berry的文化适应模型编制,而且针对东亚地区居民接触新文化后的适应状况,与本研究对象最为接近。^②翻译后,结合当地居民的语言特点,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经济水平,风俗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实际情况加以修订,最终制成题项数量为37项的7级评分Likert量表《哈尼族聚居区居民文化适应调查问卷》。根据Berry文化适应理论,问卷不对被试强制分类,只是量化反映各种文化适应倾向水平,避免了贴标签式的测量。具体分为同化、分离、融合、边缘化四个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该倾向越显著。各分量表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0.77, 0.76, 0.74, 0.85。前期研究中,使用Lisrel软件,对200名哈尼族居民的数据进行了一阶四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参数如下: $\chi^2/df = 1.858$, $P = 0.54$, $RMSEA = 0.050$, $GFI = 0.90$, $AGFI = 0.88$, $PGFI = 0.73$, $NFI = 0.79$, $NNFI = 0.87$, $CFI = 0.88$ 。数据与理论结构基本符合,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问卷发放与回收由研究小组成员实地进行,组员以精通当地语言的人员为向导,入户向符合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当面填写完成后收回。对汉语阅读存在障碍的居民口头解释题目意义,然后根据其回答填写问卷。对每户访问对象尽量保证每一代人都抽取男女各半。发放同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一对一访谈,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了解,并记录被试的个人情况。问卷回收后将数据录入电脑,使用统计软件SPSS处理。

四、结果

(一) 总体情况

由于是分类型的量表,因此并不计算总分,只对各分量表进行统计。总体看来,同化,分离和边缘化三种类型表现比较明显,而融合倾向较少。从四种适应倾向相互关系来看,同化与分离有显著互斥,呈现显著负相关($r = -0.17$, $p < 0.01$),

² ①刘凤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与森林资源的管理——云南金平马鞍底乡部分哈尼族村寨的案例研究》,《林业与社会》2004年第2期。

②Barry Declan T. Development of a New Scale for Measuring Acculturation: The East Asian Acculturation Measure (EAAM). Journal of Immigrant Health, 2001, 3, (4): 193 — 19.

而分离与边缘化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5$, $p < 0.01$)。提示高同化与低分离倾向共存, 而高分离与高边缘化倾向共存。

表 1 总的结果分量表 N 总分

分量表	N	总分 $M \pm SD$	均分 $M \pm SD$
同化	511	42.56 ± 4.02	4.25 ± 0.40
分离	511	38.78 ± 3.14	4.31 ± 0.35
融合	511	19.25 ± 2.86	2.41 ± 0.36
边缘化	511	39.66 ± 2.55	4.40 ± 0.28

(二) 民族与性别差异比较

对不同民族和性别等重要身份属性进行差异比较, 结果发现民族间差异显著, 但性别差异不显著, 无论哈尼族还是汉族对象都是如此。虽然过去一些调查发现当地哈尼族妇女社会地位较低,^③ 但从此次调查来看, 这并未影响到其文化适应表现, 民族属性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表 2 哈尼族与汉族被试得分情况及比较结果

分量表	民族	N	$M \pm SD$	t	p
同化	哈尼族	319	41.67 ± 3.00	-6.66	0.000
	汉族	192	44.02 ± 4.97		
分离	哈尼族	319	39.95 ± 2.61	12.48	0.000
	汉族	192	36.82 ± 2.96		
融合	哈尼族	319	20.03 ± 2.39	8.43	0.000
	汉族	192	17.96 ± 3.11		
边缘化	哈尼族	319	39.76 ± 1.67	1.10	0.273
	汉族	192	39.50 ± 3.56		

³ ① 谢涌, 朱波: 《哈尼族传统习俗与森林资源管理——以云南金平马鞍底乡为例》, 《西南林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汉族居民的同化倾向总体较高，而哈尼族居民的分离与融合倾向较高，边缘化倾向没有差别。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反应了当地文化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以及年龄和定居时间的被试进行比较发现，他们对于文化适应均有一定影响。

（三）文化水平差异

不同文化水平的哈尼族被试在同化分数上有显著区别 ($F = 3.47, p = 0.016$)，使用LSD法事后检验发现，文化水平较高的被试，同化倾向越明显，特别是大学文化的居民同化倾向显著高于初中 ($p = 0.003$) 和小学文化居民 ($p = 0.013$)，有放弃原有文化，接受主流文化的倾向。而对于汉族被试，文化水平产生的差异体现在分离分数上 ($F = 11.5224, p < 0.001$)，事后检验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汉族居民，分离倾向越明显。其中大学文化的居民显著高于其他所有文化水平的居民 ($p < 0.001$)，其拒绝接受民族文化，而保留汉文化的意愿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对象，年龄也较小。其中高中以上文化居民的平均年龄仅有22.1岁，显著低于38岁的总体平均年龄，其中教育行业和基层干部普遍处于该层次。也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教育水平已得到显著改善。

（四）年龄与定居时间

在年龄和定居时间分析中发现，总体来看，年龄对文化适应影响较小，而定居年限则与多项分数显著相关。其中哈尼族被试年龄与定居年限高度相关 ($r = 0.83, p < 0.001$)，居住流动性较小，年龄 ($r = -0.156, p < 0.01$) 与定居年限 ($r = -0.125, p < 0.05$) 均与同化分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即年龄大，定居时间长的哈尼族被试更不容易被主流文化同化。而汉族被试的年龄与定居年限相关较低 ($r = 0.47, p < 0.001$)，居住流动性更大。其定居年限与融合显著负相关 ($r = -0.160, p = 0.027$)，与边缘化倾向显著正相关 ($r = 0.191, p = 0.008$)。即定居时间越长，越拒绝多元文化的融合，而产生相反的边缘化倾向，对原有文化和周围的民族文化均产生抵触。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定居时间与三种文化适应倾向分数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年龄因素不存在这种关系。综合分析，文化接触的时间更能代表实际的文化接触积累水平，特别是在人员流动性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定居时间可能是比个体年龄更加可靠的预测因素。

表3 定居年限与文化适应倾向得分回归显著性检验

民族	自变量	因变量	Beta	F	t
哈尼族	定居年限	同化	-0.125	5.05*	94.27***
汉族	定居年限	融合	-0.160	4.97*	44.28***
汉族	定居年限	边缘化	0.191	7.16**	96.09***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五）个体相对经济状况

被试的经济状况从相对最差到很好分为七个等级，由被试在问卷中自我评价，并由调查者在访谈中予以确认。虽然地处国家级贫困县，但随着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惠及农村，马鞍底乡居民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已经明显改善，居民对于经济现状自评等级均值达到4.07。其中汉族居民 (4.21 ± 0.87) 又显著好于哈尼族居民 ($3.99 \pm 0.72, t = 3.13, p = 0.002$)。等级相关分析发现，汉族和哈尼族被试均存在经济状况越好，边缘化倾向越低的显著关联 ($r_{\text{汉}} = -0.166, p = 0.02, r_{\text{哈尼}} = -0.142, p = 0.01$)，说明边缘化可能与社会适应水平有关。除此以外，汉族被试的经济状况还与分离倾向显著正相关 ($r = 0.193, p = 0.007$)，即经济状况越好的汉族居民，越不接受少数民族文化，而倾向于保持原有文化。

五、讨论

（一）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适应状况分析

结合实地访谈的结果，本次调查显示，汉族与哈尼族居民间的适应，可以用“融洽但不轻松”来概括。该地区因外部主流文化发展，迫使内部文化适应加速进行。尽管双方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但也都在努力寻找适应对方的方法。

该地不同民族居民的文化适应状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区别。相似性主要体现在适应倾向多元化上，其中同化，分离，边缘化三种倾向都在类似程度上存在，但融合的得分较低。这一特点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虽然融合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适应方式，但对于个体的文化灵活性有高度要求，多出现在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年移民中。这些人具有高自尊，低抑郁，亲社会，善于调和竞争性文化信条的心理特征，在总体人群中通常不占多数。^④ 另外，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特别是语言差异的大小，也是影响融合型适应者产生的重要因素。^⑤ 此次研究对象面临的是语言和习俗差异较大的两类文化，再加上当地哈尼族居民也仅占少数民族人口半数左右，多种民族的杂居环境，导致当地居民面对的是异常复杂的文化环境，提高了融合型适应的难度，因而多数人仍以同化和分离的适应策略为主。与此相对，以大学生为被试群体的研究中，由于经过了语言等能力的筛选，并且转移到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融合型适应的比例就明显高出很多。^⑥ 这印证了良好的文化适应取向与高社会适应水平，以及高个人成就之间的正性关系。另外，对于缺乏文化适应灵活性的对象来说，这两种策略一定程度上是互斥的，从数据上反映为二者分数具有显著负相关。但随着文化适应灵活性的增加，这两种策略都可以逐步向融合转化。值得重视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倾向，在四分类模型中，这是社会文化疏离的表现，但学术界对此论断尚有争议，将在下文专门讨论。

两类群体的区别除了具体适应倾向，在与个体社会背景有关的适应模式上也有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反映出文化适应和个体社会功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汉族居民的文化适应取向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而且与个体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显著相关。例如在同化和分离的选择上，汉族居民总体上比哈尼族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同化，而非分离的策略。但是其中高文化和高经济地位的汉族居民，其保持固有文化的意愿明显，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倾向较少。相对来说，哈尼族居民表现出较大的内部一致性，受个体经济和文化背景影响不大。

虽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融合倾向，调查也并未在马鞍底乡发现族群相互排斥的现象。该乡不仅生活资源有限，而且各民族日常接触十分密切和密集，但也没有发生过基于文化群体的群际冲突和排外事件。因为生活资源冲突等原因，这种排斥在国外经济落后的大型文化聚居区中十分常见。^⑦ 从实地访谈的结果，结合当地近年来社会发展趋势分析，这一现象可能与各族居民

⁴ ①Chen, S. X. , Benet — Martinez, V. , & Bond, M. H. Bicultural Identity, Bilingualism,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mmigration — Based and Globalization — Based Accultur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8, 76 (4) : 803 — 838.

②Wang S C, Schwartz S J, Zamboanga B L. Acculturative Stress Among Cub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Pathways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40 (11) : 2862 — 2887.

③张劲梅，张庆林：《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分类学研究》，《思想战线》2009 年第 2 期。

⁵ ①Briones E, Montgomery M J, Schwartz S J. The Role of Identity in Acculturation among Immigrant Peop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Empirical Questions, and Applied Recommend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2006, 49 (1) : 1 — 30.

②Akhtar, S. , & Choi, L. W. When evening falls: the immigrant's encounter with middle and old age, *Am J Psychoanal*, 2004, 64 (2) : 183 — 191.

③Berry J W. Mutual attitudes among immigrants and ethnocultural group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追求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有关，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文化适应现状的社会背景因素分析

接受访谈的哈尼族居民，在适应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多数感觉并不轻松，在语言和生活习俗适应方面存在诸多难题。文化适应理论指出，这种困难与社会学习能力有关，在年龄较大的居民身上表现更加明显。^②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否认适应主流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近年来，基础和通讯建设速度加快，给当地年轻的少数民族居民提供了更多交流机会。他们对外出务工，进城就业有较大兴趣，即使在家庭经济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也表示愿意前往城市开阔眼界。这些居民在初次外出经商和打工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有经验的同村人作为向导，翻译和介绍人。这种合作模式增加了不同民族居民间的交流合作。同时，当地居民对于开发旅游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共同的意愿。通晓主流文化的居民，特别是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此认识更深。另外，媒体和网络的普及，不仅让外界了解当地，也让当地人认识到融入主流经济环境的重要性，加之近年来旅游资源的开发，更促进了各族居民学习和适应主流文化的积极性。调查也发现，很多年龄较大的哈尼族居民，虽然自身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存在困难，但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大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既说家乡话，也说汉语”，成为融合型的文化适应者。

在此环境下，当地汉族居民虽然人数不多，但充当了民族地区与外界交流的中介和桥梁，意义重大。这种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近年来不断提升，给熟悉汉文化的居民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让当地居民更倾向于主动适应和学习汉文化。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占当地人口绝对少数的汉族居民能够在高度保持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也能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居民互惠互利，和睦相处。

另一方面，汉族居民要起到这种沟通的作用，也需要在保持固有的主流文化属性基础上，具备对民族文化的适应和了解，甚至融入，即保持一种基于主流文化的双文化适应。汉族居民对此同样感受到一定的压力，甚至更愿意“入乡随俗”，在同化方面表现出比哈尼族居民更高的倾向。不过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对于汉族居民的文化适应期望——又称“背景接受”（context of reception）——十分宽松，让处于少数人口地位的汉族居民没有感受到太大适应压力，而这种压力往往是导致文化适应中出现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③此外，国外的大型少数民族聚居区还经常出现文化遗产的压力，即排外性的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妨碍其中的居民适应主流文化。^④而在此次调查中没有发现此类迹象，说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文化适应倾向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6, 30 (6) : 719 — 734。

^②①Rodriguez, N. , Myers, H. F. , Mira, C. B. , Flores, T. , & Garcia — Hernandez, L.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Acculturative Stress Inventory for adults of Mexican orig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2, 14 (4) : 451 — 461。

② [美] E. 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55 ～ 262 页。

③余伟，郑钢：《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5 年第 6 期。

④Lee S, Sobal J, Frongillo E A. Comparison of models of acculturation: the case of Kor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2003, 34 (3) : 282 — 296。

⑤Schwartz, S. J. , & Zamboanga, B. L. Testing Berry'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a confirmatory latent class approach. [J].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08, 14. 275 — 285。

⑥Unger, J. B. , Gallagher, P. , Shakib, S. , Ritt — Olson, A. , Palmer, P. H. , & Johnson, C. A. . The AHIMSA acculturation scale: A new measure of acculturation for adolescent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Journal of*

并不封闭。

马鞍底乡这种文化适应现状，还可从当地宏观社会发展目标解读。文化适应双方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最终决定了各自在文化适应倾向中的选择。而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一定程度上会督促不同文化群体努力相互适应和协作，这一特点是社会管理者应该善加利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证明，如果不同文化群体具有共同的目标，并且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处于协作和依赖，而非资源竞争的关系，就可以减少相互排斥。这些方法在解决族群冲突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从谢里夫的合作实验，到阿伦森的拼图教室（The Jigsaw Classroom），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②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深入人心，当地各族居民在这方面意见基本一致，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各族民众的合作而非竞争。例如当地哈尼族居民人口众多，而且将自然资源的有序管理方式通过文化代代相传。而当地长期定居的汉族居民，则具有沟通外界的功能。两者之间有一定互补关系，进一步拉近了当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合作意愿。所以，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核心要素，是需要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社会发展目标，而不是文化内容相似性和人口比例等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管理者也应该特别注意社会资源分配问题，要保证各种族群能公平的享受劳动成果，避免无谓的资源竞争在不同文化群体间催生排斥和对抗。

（三）多维度文化适应理论的检验和发展

虽然Berry 的多维度文化适应理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但该理论在诞生之初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而世界各地文化多样性决定了该理论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检验和调整。进入20 世纪下半叶，各国跨国移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新的特点：移民人口开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而非如原来大多来自社会下层；移民动机也变得多样化，除了劳动力输出和寻求安全庇护，也包括资本和技术转移等；相对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跨国出行的便捷政策，还造就了大批流动性较高的旅居人士。在此背景下构建的多维度文化适应模型，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传统西方发达国家解决所面临的移民问题，该理论在我国是否依然适用，仍需接受实证检验。^③

国内文化适应研究热点是城市移民人口的文化适应问题，包括进城务工人员，整体移民搬迁对象等。这与多维度文化适应模型的建立背景较为接近。而像本次研究所涉及的世居少数民族聚居地，是过去研究较少涉及的情况。从初步结果看，结果仍然证明了多维度理论的有效性。包括适应倾向的总体特征，适应倾向与个人社会背景的关联性，融合型适应与较好的社会功能的相关，边缘化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较差等特点，均符合多维度理论的预期。与此同时，关于边缘化类型的存在和解释是该理论争议焦点。过去二十年中，曾有多项研究对非西方文化样本数据进行聚类 and 因子抽取，虽然同化，分离，融合这三类倾向证据都很明显，但边缘化维度总是难以得到同样的支持。^{④⑤} 而且边缘化测量的分数本身也缺乏稳定性，信效度均不如其他维度。^⑥

此次调查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在多种因素中，只有经济状况这一反映个体社会地位的指标与边缘化倾向呈现显著关联。访谈中也发现，经济状况较差的居民经常述说对邻里协作和基层干部工作不满，也容易提到对各种文化习俗不适应。这些特点提示，所谓边缘化倾向，很可能是个体存在其他社会适应不良问题，从而在文化态度上反映出的疏离感倾向，而非某种特定的文化适应类型。同样的例证来自于对跨文化迁移的难民群体研究。无论来自何种文化的难民，都经常因为身份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其文化适应状况通常也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瓦解等问题甚至波及到下一代。^⑦

Early Adolescence, 2002, 22, 225 — 251。

⁷ ①Akhtar S. The Immigrant, the Exile, and the Experience of Nostalgia,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1999, 1 (2) :123 — 130。

②Chirkov V. Summary of the criticism and of the potential ways to improv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9, 33 (2) : 177 — 180。

正确的理解边缘化倾向的内涵，有利于提早发现文化适应相关的社会问题。对高边缘化的个体，应该更重视其在文化适应领域以外面临的社会适应问题，而非简单的给予文化说教。如果边缘化主要是社会适应不良带来的结果，那么改善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困境，舒缓社会环境导致的心理压力，其文化适应水平也将自然得到改善。

此外，鉴于文化接触的方式十分多样化，并且不同群体的心理测量数据特征确实有差别，包括 Berry 在内的多位社会学者也建议给予文化适应模型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理论模型做出调整。例如 Berry 就针对北美主流社会的情况，提出第三个文化适应维度：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期望。这一维度解释了北美历史上民族文化政策的变迁，包括“熔炉”，“种族隔离”，“种族排斥”，以及今天的“多元文化”政策等。此类调整将文化以外的社会因素考虑进来，能够使多维度文化适应理论更具说服力。^③此外在过去对难民、二代移民、民族飞地等特殊情况的研究中，都对多维度模型中影响文化适应的具体因素进行了修订和补充。^④要决定如何进行此类调整，需要掌握研究对象的个体和社会背景，包括人格，社会经济地位，原有文化类型，语言情况等，相应的实地调查也是必不可少的。^④这种调整也必须是谨慎的，要以提升理论的预测功能为目标，而非拘泥于让模型满足数据拟合度等技术指标。民族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以高敏感性的心理测量技术去提早发现现实的社会问题。单纯的为了迎合某种数学标准而修改理论模型，导致失去其应用价值，是本末倒置的。边缘化倾向虽然在数据拟合中表现不佳，但因其所包含的重要信息，所以依然应该受到重视。

③Schwartz S J, Unger J B, Zamboanga B L, et al.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accultu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0, 65 (4) : 237。

④Rohmann, A. , Piontkowski, U. , & van Randenborgh, A. When Attitudes Do Not Fit: Discordance of Acculturation Attitudes as an Antecedent of Intergroup Threat,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08, 34 (3) : 337 — 352。